

編者的話

當蘇聯的三日政變失敗，反而讓戈巴契夫、葉爾欽藉著「政變的政變」，順水推舟的讓紅色蘇聯帝國崩塌瓦解之際，馬克思列寧主義在全球的反宰制論述市場裡似乎不再是金字招牌。

當標榜社會主義的國家漸次從地圖上易幟後，基於「存在決定意識」的塵俗標竿，既然現實存在的政治實體都被證明為實驗失敗的產物，那麼它背後所揭櫫的社會主義理想自然受到質疑。列寧銅像的被拉下馬，馬克思的名言：「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被改易為：「全世界無產者，請原諒我！」，都祇是這股反共浪潮衝擊下可想而知的事端。當世上殘存的幾個人民共和國猶在吶喊固守馬列基本教義時，最沮喪、焦躁、痛心的除了幾個人民共和國的領導人外，就是昔日曾為社會主義理想獻身並因而受到國家機器輾壓數十年歲月的老左派。拋開感性的怨懟，值此革命退潮的年代，我們的創刊號推出了「革命家的台灣形象——葛蘭西一〇〇專輯」，是否還有意義呢？

首先，我們當知所有的歷史敘述（尤其是基進、批判的敘述）都是企圖由沈澱的人民記憶裡，淬取「當下需要」的歷史主體性。因此，我們不用「紀念」之類略顯封建、呆滯的字眼來刻畫此一專輯。馬列基本教義派所執者的是，葛蘭西在國際工（共）運史上的地位、他與列寧主義的關聯，更重要的是確認他還是「正統」馬克思主義者。然而這樣的葛蘭西圖像，是活絡了他思想的生發力源呢？還是又使一個革命思想家仆倒在歷史的祭壇前呢？於此，我們深深質疑著。

當外在的革命環境不存時，基本教義派常會栖邊躁動，而後陷入極端唯意志論的虛構幻象中。然而他們忽略了在此階段裡，一個基進的批判行動者最需要的是新論述（批判的武器）的創發——一種不拘泥於舊教義，甚至還是離經叛道的論述。而且這種新論述是立基於當

下的在地 (local) 情境之上，它不應受先驗的本質論教義用顯微鏡逐一檢證。因此「革命家的台灣形象」不以恢復葛蘭西的本貌（他的本貌是什麼，其實迄今尚無定論）為唯一職志，而意在提供新的路徑供所有的批判工作者粗略的藍圖。形象的定位與觀照並沒有單一的可能性，因此以多元的面向取代正統的形塑，新論述才可能躍現迸出，這是我們設計此一專輯的目的之一。

再次，與盧卡奇、科西並列為「西方馬克思主義」鼻祖的葛蘭西，十多年來其有關文化霸權、知識分子角色、civil society、陣地戰等概念，在整個歐美基進思潮中作了高度活潑的運用。七〇年度中期《目標》(Telos)雜誌的畢孔(Paul Piccone)曾說：「進入八〇年代，則可視為『葛蘭西主義』(Gramscism)的新紀元。」不論畢孔是基於什麼樣的觀察作如此的預測，事實的發展卻印證了此一說法具有相當的可信度。

葛蘭西理論一定程度上成為反宰制族群的顯學，除了外緣條件的配合——《獄中札記》（雖然只是選譯）、《獄中書信》、《政治著作選集》英譯本於七〇年代後陸續問世，使得英語世界的人口得以一窺其思想的堂奧外。更重要的是以阿圖塞(Louis Althusser)、普蘭札(Nicos Poulantzas)為代表的「結構主義馬克思主義」，雖然對意識形態與國家機器的關聯作了縝密的剖析，然而類似的剖析迅即面臨的難題便是：在國家機器無所不在的「關注」下，反宰制族群的集體動力該從何而創生？主體既是經由意識形態所建構，那麼在資本主義體制下，不同的弱勢或邊緣族群如何進行聯結(articulation)？顯然，「結構主義馬克思主義」難以有效的回應。

而葛蘭西的思想適時的如甘霖般受到青睞。於是無論是理論的闡發，還是援引為新社會運動的理論要素，葛蘭西的思想有日新又新的趨勢。就台灣此間而言，無論是民間社會論還是人民民主論的提出，在相當程度上是得助於葛蘭西。基此，我們並非以膜拜聖者的心態來策劃此一專輯，而是為著此間運動的實際需要作平實的闡述，這是我們構思此專輯的另一目的。

就專輯內容而言，陳巨擘的〈南方問題與知識分子〉著墨於知識分子與革命實踐的關聯。Norberto Bobbio的〈論葛蘭西與市民社會的概念〉一文，是西方世界探索葛蘭西有關市民社會論的極重要力作，遂全文譯出以供讀者饜享。蔡其達的〈從市民社會到無產階級國家——葛蘭西的國家理論〉，則由市民社會／國家間的辯證互動過程，鋪陳出葛蘭西的國家理論。Chantal Mouffe的〈葛蘭西的霸權和意識形態論〉，則縷述了葛蘭西如何跳脫出「經濟主義」的窠臼，重新建構、反思歷史唯物論的努力來。